

陈介祺的瓦当收藏与琅琊台瓦当的传拓

文 / 李斌

陈介祺的瓦当收藏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瓦当虽形制小巧,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北宋时就有学者关注瓦当。明清之际,随着考据学和金石学兴起,学者们开始走出书斋,广采古物遗文,以期抉剔史传,发挥经典。文字瓦当因能考经订史而备受重视。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朱枫撰《秦汉瓦图记》,成为首部瓦当专著。嗣后毕沅、程敦、王昶、俞肇修、申兆定、翁方纲、钱坫、黄易、孙星衍、阮元等人,迭有收获。此外,由于当时碑学书法勃兴,“刻在青铜器、砖瓦、摩崖上的古代铭文,也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由此秦汉瓦文始大显于世,其中陈介祺在瓦当的收藏、著录与传拓等方面颇有成绩。

陈介祺对瓦当收藏和集拓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图书馆藏《陈簠斋藏瓦当文字》中。该拓本为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制,共18册,收战国、秦、汉瓦当约900件。目前尚能见到的传世拓本还有何遂旧藏本《簠斋瓦当拓片》、日本学者小木太法藏《秦汉瓦当拓本》、徐世襄藏拓本2册、南京图书馆藏《簠斋藏瓦当文拓本》等。2008年,国家图书馆金石拓片组从《陈簠斋藏瓦当文字》中精选较为完整且具代表性的瓦当拓片200余纸,编辑成册出版。同时,国家图书馆藏《陈簠斋藏瓦当文字目录》亦刊布,使我们得窥陈介祺藏瓦的大略。

陈介祺收藏的瓦当以文字瓦当为主,兼有少量纹饰瓦当,包括战国秦汉时期的几何纹、动植物纹、云纹瓦当,以及汉以后的莲花纹瓦当等。其藏品主要来自关中地区,其次是临淄、青岛琅琊台,还兼及洛阳、曲阜、即墨、赣榆等地。在陈介祺之前,诸家收藏和著录之瓦以关中地区所出为大宗。陈介祺因居邻齐鲁故都的地利之便,别求关中外之瓦当,开大规模收藏临淄齐瓦的先河。此外,陈介祺对琅琊台瓦当的收藏与传拓值得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琅琊台瓦当珍稀难得且陈氏藏量丰富,还因为这批瓦当涉及文字瓦当始出年代的学术争议,并集中体现了陈介祺的收藏特点与研究旨趣。

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年)辞官归里,潜心于金石之学,素以收藏宏富、精于鉴古闻名海内,其收藏种类繁多,数量惊人且不乏精品,涉及铜器、石刻、玺印、封泥、钱范、瓦当等。对此,吴大澂评价道:“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先秦文字及周玺、汉印、封泥、秦汉瓦当毕萃于尊斋。”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琅琊刻石（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陈介祺与琅琊台瓦当传拓

琅琊台位于今天青岛黄岛区西南部，遗址三面环海，由琅琊山顶的夯土台基（大台）、海边的夯土台基（小台）等多处遗迹组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颂德，即著名的“琅琊刻石”。

至晚清时，琅琊台遗迹湮没，仅存琅琊刻石。因此，陈介祺收藏琅琊台瓦当尤为珍贵。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十二日，陈介祺在给鲍康的信中写道：“琅琊台瓦当，秦瓦也，藏四十年得五瓦。”同年8—10月，陈介祺委托助手和拓工丁少山、王石经、何昆玉、宫

玉甫等人到琅琊台寻访捶拓秦琅琊刻石、琅琊台瓦当等文字遗迹，并乞嘱丁少山作日记见示，以当同游。经全力搜罗，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陈介祺所获琅琊台瓦当的数量已颇为可观。吴大澂在陕西出土“千秋万岁”残瓦拓片上题跋时提及：“陈簠斋文：游琅琊台，掘得秦瓦三百余。文各不同，余得其全，分拓墨。大半皆‘千秋万岁’。”（吉树春主编：《潍坊市博物馆馆藏选粹[综合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

陈介祺重视琅琊台瓦当，一是因为其文献价值，二是因为其书法艺术。虽然陈氏实际所获琅琊台瓦当多为“千秋万岁”之吉语瓦当，作为文献考据价值已不大，但其作为秦代铭文书法极具研究价值。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二月廿二日，他在致吴云的书信中说：“秦汉以后之篆与用柔毫之法，则必以斯相为宗。近熟读琅琊刻石及瓦字，颇有所得”（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此“所得”即对琅琊台瓦当文字书法价值的发现。陈介祺对瓦当书法价值的重视使他有别于宋元明及清代前期的瓦当收藏家。嗣后，吴大澂、端方、康有为等人继而对瓦当的书法价值有所发微。康有为更是以瓦当文字来证书体之变迁、文字之源流。

此外，陈介祺在瓦当收藏与研究上的另一大贡献是推动瓦当传拓。陈介祺不仅崇古、好古，而且还重传古。这里说的传古，即忠实于文物的原本，将之再现以传后世。其中，制作拓片就是主要的形式。作为实物的替代品，拓片的制作与今日的印刷十分相似。在陈介祺看来，传古之首要在于传古文字，曾言：“古物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又说自己“既知所学之陋，又无近名之心，唯耿耿于古文字之传耳”。陈



谢国桢整理陈介祺藏秦汉瓦当拓本

介祺还强调：传古不可不多拓，多拓不可不护器，且传古当“以精拓传世方是己物，不然何以信今传后，岂可虚此一藏”（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陈介祺对琅琊台瓦当的传拓与刊布，受到金石学界的重视与追捧。他在寻获琅琊台瓦当后，立即通过书信与吴云、潘祖荫、鲍康、吴大澂等同好分享拓片，并详细记录相关细节。例如，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致鲍康的信中提到派遣工匠寻访、拓印秦瓦残片，并在光绪元年（1875年）寄给吴大澂大量瓦当拓片。由于拓片制作精良、清晰度高而广受推崇。

陈介祺的努力使琅琊台瓦当逐渐为人所知。民国时期，罗振玉的《唐风楼

秦汉瓦当文字》收录了数种琅琊台瓦当，其在序言中指出：“咸同以来，齐之琅琊台、万里沙之瓦多出土者。光宣之世，则若真定、若易水、若中州，渐发现于当世。”

琅琊台瓦当年代争议

陈介祺发现并传拓琅琊台瓦当后，该地区长期未有新发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出土瓦当。1982年3月，琅琊台顶部出土一件完整的“千秋万岁”文字瓦当，现藏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1986年4月，琅琊台遗址又发现瓦当4件，包括仰复卷云纹瓦当1件、篆书“千秋万岁”瓦3件。吕树芝在《秦琅琊台瓦当》（《历史教学》1987年第4期）一文中仍



琅琊台遗址早前发现的瓦当：图①② 陈介祺藏拓（《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瓦当卷》）图③④ 1986 年出土（吕树芝《秦琅琊台瓦当》）

将其定为秦代遗物。

2019—2024 年，考古工作者又于琅琊台台顶区域发现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及石柱础、瓦当等建筑构件，经持续发掘，确认位于遗址中心的山顶夯土为“秦修汉葺”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庞大的工程量以及高等级遗存应可证实其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瓦当有“千秋万岁”文字瓦，形制大小、篆书风格与陈介祺传拓和 1982 年、1986 年的考古发现相似，

当面被十字凸线界格四分，每区各布一字，篆书“千秋万岁”。此外，还在琅琊台南麓，俗称“窑沟”的深沟附近清理窑址 10 座，均为马蹄形半倒焰窑，出土大量残断的板瓦、筒瓦、瓦当、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山顶大台发现的基本一致。半圆形夔纹大瓦当残块，形制大小、图案等与陕西秦汉栌阳城、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行宫等遗址所出相近。据此可初步推断这批陶窑为秦代烧制建筑材料



琅琊台遗址鸟瞰（西南—东北，“文博中国”公众号）



琅琊台山顶建筑基址东北部排水管道（“文博中国”公众号）

的砖瓦窑，但在窑址区内未发现“千秋万岁”文字瓦当，说明其年代较晚（吕凯、彭裕、李祖敏：《秦皇汉武东巡地海上楼台现真容——琅琊台遗址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日）。这些考古新发现为我们回溯琅琊台瓦当的传拓及研究史、讨论琅琊台文字瓦当

的年代提供了新的契机。

陈介祺一直将琅琊台“千秋万岁”瓦当视为秦代遗物，但后来意识到其中部分为汉物。如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底致潘祖荫的信中提到，丁少山所得琅琊台瓦当“其字屈填者乃汉非秦”（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



2019—2024年琅琊台遗址发掘出土瓦当（“文博中国”公众号）

齐鲁书社, 1991 年)。“其字屈填”或指字体盘屈回环, 随形布局、填满界格一类, 与迢严端庄的秦篆迥异。陈介祺对文字瓦当的断代主要基于字体风格, 从书法角度出发, 且承认秦代已有文字瓦当。

然而, 陈介祺的这一判断不仅影响了同时代学者对其他遗物的断代, 还引发了文字瓦当始出年代的争议。同为潍县收藏家的高鸿裁受其影响, 将所藏“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十二字汉砖误定为秦物。高氏谓: “即以篆体而论, ‘臣登成道’见峰山刻, ‘岁’见琅琊台瓦, 虽笔迹小异, 而迢严端庄, 与斯相遗法, 无毫发差殊。”及至今日仍有学者沿用陈氏观点, 如《琅琊台志》将 1982 年出土于琅琊台顶部的“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定为秦代文物。甚至有学者据陈介祺之说而总结出秦文字瓦当的断代标准, 不免以讹传讹(徐畅:《秦汉文字瓦当界定的标准——试论陈介祺对秦汉瓦当断代的贡献》, 载孙慰祖等编:《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 西泠印社, 2005 年)。

关于文字瓦当的产生年代, 历来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文字瓦当始出于战国秦或秦代, 北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清代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一致坚持此说, 陈介祺也属此派。以往被认为是秦文字瓦当的主要有“羽阳千岁”“兰池宫当”“橐泉宫当”“薪年宫当”“维天降临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以及琅琊台“千秋万岁”瓦当等。焦南峰、王保平等学者续倡此说, 但争议颇多。另一派则认为文字瓦当始出于汉代。陈直在《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 年第 11 期)中较早质疑前人看法, 并指出此前被认为的秦文字瓦当均为汉代作品, 秦代只有画瓦而无文字瓦。此后, 刘庆柱在《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 1 辑, 科学出版社,



高鸿裁藏“海内皆臣”十二字砖拓片(熊龙:《西汉“海内皆臣”砖研究》,《四川文物》2011 年第 6 期)

1994 年)中从考古资料出发, 指出文字瓦当的出现可能在景帝前后, 其普及应在武帝时期, 西汉中晚期为文字瓦当发展的盛期。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者的认同。由此, 以往琅琊台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更有可能是汉物而非秦物。

回顾陈介祺与琅琊台瓦当的发现、传拓及研究历程, 可见其对文字瓦当的断代主要依据文字书体, 这种方法过于依赖学者个人的经验和学识, 缺少对出土情境的关注, 主观性较强, 带有明显的“望气”色彩。这是陈介祺作为一个传统金石学家的局限。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 弥补了金石学在科学性上的局限, 使瓦当研究更加系统、严谨。然而, 陈介祺对古代文物与文字遗迹的笃好, 以传古为志业的精神追求, 为金石学厚植了文化底蕴, 也为考古学研究带来更深层次的启示。^[A]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